

柄谷行人文集

赵京华 主编

世界史的构造

柄谷行人

赵京华 译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柄谷行人文集

赵京华 主编

柄谷行人

赵京华 译

著

世界史的构造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史的构造 / (日) 柄谷行人著; 赵京华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117-3361-0

I. ①世… II. ①柄… ②赵… III. ①社会结构—研究—世界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3961 号

SEKAISHI NO KOZO

by Kojin Karatani

©2010 by Kojin Karatani

First published 2010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aracter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7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世界史的构造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王 琳 朱瑞雪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中文版序言

本书是从“交换样式”的角度重新观察社会构成体历史的一个尝试。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考察的，具体说，就是从“谁掌握生产手段”的视角。一般认为，这种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政治、宗教及其他文化方面的东西则为观念性的上层建筑。然而，这样一种经济政治相分离的做法乃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因此，它在说明资本制以前的社会时，有很多困难之处。因为，在亚细亚国家和封建社会那里，政治统治和经济支配是不可分离的。而这之前的氏族社会，就更是如此。而且，当我们观察当代资本制社会的时候，如果只是将国家和民族视为上层建筑，那也会很难看清楚。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作为能动的主体而发挥其功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经济被扬弃，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 and 民族也会自动消亡，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结果，他们在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上受到了挫折。

后来，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重视上层建筑的“相对

自律性”。具体而言，为了完善经济决定论，他们导入精神分析、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与见解，可是，结果又导致对“经济基础”的轻视，以至于很多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否定“经济决定论”，而从各种角度强调上层建筑的自律性。随着各种学科在制度上的细分，这样的态度变得更为普遍并被正当化。这最终导致两种视野——综合地、体系化地观察与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相关之结构的视野，和对如何扬弃现实状况做出展望的视野——的丧失。

在本书中，我重新对“经济的”维度进行了观察。不过，我所说的“经济”并非生产方式，而是作为交换样式所看到的東西。交换样式有四种类型：A. 赠与的互酬；B. 服从与保护；C. 商品交换；以及超越上述三种样式的D。在任何社会构成体中，这些交换样式都是共生共存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占了统治地位，则事态就会变得不同了，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样式C是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不是从生产方式，而是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来考察资本制经济的。就是说，他从交换样式C出发论述了观念性的上层建筑是怎样派生出来的。资本主义根本上是作为一个“信用”的体系而存在的，因此它始终隐含着“危机”。对于这种状况的阐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最为突出。

另一方面，对资本制以前的社会，马克思只做了简

单的考察。但是，如果因此就批判马克思，那是很不应该的。如果有闲暇去批判，还不如像马克思研究交换样式 C 那样，从其他的交换样式 A 和 B 出发，去阐明观念性的上层建筑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在本书中所做的就是这种工作。这里，仅就我所处理的问题之一，即交换样式 A 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是怎样产生的，略做说明。这并非单单是史前时代的问题。

自马塞尔·莫斯以来，人们一般认为原始社会中交换样式 A（赠与的互酬）是占统治地位的原理。然而，这种原理并不存在于远古以来出现的游动狩猎采集民的集体社会中。在这样的集体社会中，由于无法积攒生产物，因此往往是将其汇聚（pool）起来而实行平等的分配。而且，因为对个人加以限制的集团力量比较弱，因此婚姻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形式。就是说，此乃个人相对自由因而平等的社会。另一方面，采取互酬性原理的氏族社会，是游动狩猎采集民定居下来之后形成的。定居使财富的积蓄成为可能，但这又导致了财富和权力的差距乃至阶级的分化。氏族社会则通过赠与和还礼的义务而抑制了这种危险性。当然，他们并非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交换样式 A 作为“被压抑物的回归”（弗洛伊德）以强迫的方式显现出来。只是，氏族社会的难点在于有平等而没有自由的个人存在。

氏族社会的起源问题十分重要，理由如下：众所周知，马克思设想在远古社会有“原始共产主义”产生，

而在发达资本主义之上得到恢复的原始共产主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今天，这种观点往往作为疑似宗教的历史观而遭到否定。另外，根据现存有关原始社会的人类学知识来看，“原始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只能予以否定。可虽说无法从经验上获得证实，那也不能因此就否定掉“原始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也不应该如此。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却回避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模仿摩尔根的方法，从氏族社会中发现了“原始共产主义”的模型。可是，他们不应该从氏族社会而是应该从之前的游动狩猎采集民社会中去寻找。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游动狩猎采集民社会和氏族社会不同呢？这恐怕与他们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观察社会构成体之历史的方法有关。就是说，从生产手段共有的角度来观察，游动狩猎采集民社会和氏族社会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若从“交换样式”的角度看，则两者之间的不同，即纯粹赠与和赠与的互惠性之间的不同，乃是决定性的。

而且，当从交换样式的观点来看时，则可以对游动民的共产主义何以会回归这个问题给出唯物论式的理解。在我看来，交换样式 D 乃是在交换样式 B 和 C 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受到其压抑的交换样式 A 的回归。不过，这里我要提请注意的是，氏族社会或者其原理交换样式 A 本身已经是作为“被压抑物的回归”而存在的

东西了。在定居社会里，这种回归是试图确保游动民共产主义的东西。当然，它并非源自人们的愿望和意志，而是作为不容分说的“义务”出现的。

交换样式 D 也并非 A 的简单恢复，就是说，那不是共同体的恢复。如果没有对 A 的否定，那么在更高维度上对 A 的恢复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这也并非出自人们的愿望和意志，而是作为由神或天所赋予的“义务”或“整合性理念”而显现出来的。具体说来，是以否定巫术 = 互酬宗教的普世宗教形式而出现的。实际上也是如此，世界各地试图实现交换样式 D 的社会主义运动，基本上都是在普世宗教的外衣之下进行的。

到了 19 世纪后期，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而失去了宗教性。不过，重要的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否为宗教性的，而在于它是否以交换样式 D 的实现为志向。进入 20 世纪，社会主义所实现的只能是交换样式 B 和 C 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了，因此它失去了魅力。但是，只要交换样式 B 和 C 占统治地位，就会不断出现试图超越这种东西的冲动。就是说，交换样式 D 会以某种形式出现，而它是否采取宗教的形式，并不重要。

我的上述思考，实际上在前一本著作《跨越性批判》中已经提起过。不过，对交换样式 D 的实现，我主要还是在一国的内部来思考的，即所谓“一国革命”。交换样式 D 乃是对国家的扬弃。可是，这在一

国的内部是不可能完成的。国家总是相对其他国家而存在的，因此只要有其他国家存在，那么在一国内部对国家的扬弃就不可能做到。其他国家会马上出面干涉，如果要对此进行抵御，则必须变成强大的国家。实际上，俄国革命所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因此，我在本书中不是从一个而是从多个社会构成体形成的关系结构，即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察交换样式D的。

不过，世界体系在历史上也因为某一种交换样式占统治地位而形成不同的形态。这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微型世界体系。它是以交换样式A（互酬）占统治地位的体系，氏族社会联合体便是实例。第二，世界—帝国。它是以交换样式B（服从与保护）占统治地位的体系。第三，世界—经济。在此，交换样式C占统治地位。而这一阶段中，世界—帝国遭到分解，产生了众多的民族国家，即社会构成体采取了资本—民族—国家的形式。顺便一提，沃勒斯坦称这种交换样式C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体系为“现代世界体系”。第四，我们预想的超越上述交换样式的全新体系，即由交换样式D构成的世界体系。第四种世界体系建立在赠与的原理之上，可以说是微型世界体系在更高维度上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讲，前面有关单一社会构成体的议论也可以应用于世界体系的层面。

我从这样的角度对康德《永久和平论》做了重新

解读。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不单是没有战争的和平，而且是不存在各国之间敌对的一种状态，即国家被扬弃的状态。问题是这样的状态如何才能形成呢？康德自身想到的是各民族的联盟。这一构想在19世纪遭到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那些人的嘲笑，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则以国际联盟的形式得以实现，进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联合国。然而，虽说联合国是基于康德的理念形成的，但它与这个理念本身还有很大的距离，因为在此发挥作用的是霍布斯的原理，即以屈服于强者而获得自身安全的交换样式B。

联合国的安理会，实际上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所支配的体系，由拥有实力的强国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操控。而且，如果没有强国的存在，那么联合国就无法发挥其功能。实际上，是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以联合国名义实行着统治的。然而，即使要强化联合国的力量而建立世界政府，若依然以交换样式B为原理的话，则只能变成世界帝国那样的东西。而只要这种状况存在，就必定产生与之对抗的势力。因此，在这样的道路上不可能出现“永久和平”。

那么，“世界共和国”怎样才能实现呢？或者如何才能改变联合国呢？我在本书中强调，只有依靠交换样式D，即各国“赠与”其军事上的主权，才能实现。如果是世界政府的话，须强制性地要求各国“放弃”其主权。然而，世界共和国则唯有依靠主权的主动“赠

与”，就是说，世界共和国的秩序建立不是靠武力而是依靠赠与的力量。从交换样式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史的构造时，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

柄谷行人

2012年4月20日

日文版序言

本书通过从交换样式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社会构成体，试图打开某种超越当下资本—民族—国家的新展望。这种展望，我在前一部著作《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2001）中已经做了提示。而对此进行全面的展开则是本书的任务。因此，我将首先回顾《跨越性批判》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来阐明我的意图。

我曾把“从康德入手阅读马克思，从马克思入手阅读康德”这一工作称为“跨越性批判”。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对两者的比较合成。实际上，在这两人之间还存在着—位哲学家，即黑格尔。从康德入手阅读马克思，或者从马克思入手阅读康德，毋宁说是透过对一前一后的两位思想家来阅读中间的黑格尔。就是说，这将意味着对黑格尔予以重新的批判。

我深感这种批判的必要，是从东欧革命到苏联解体的1990年前后。那时候，正在流行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福山的这一说法，可以追溯到法国黑格尔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

夫。科耶夫是对黑格尔“历史的终结”说做过各种解释的一位学者^①，而福山则是为了赋予共产主义体制之崩溃和美国的最终胜利以意义，才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试图表明，1989年的东欧革命显示了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此后将不会再出现根本的革命，因此历史已然终结。

嘲笑福山这一说法的人不在少数，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正确的。然而，若说1990年发生的事态乃是美国的胜利，当然不对。因为，当初看上去仿佛美国霸权得以确立、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暂时获得了胜利似的，可正如20年后的今天所判明的那样，这一切都归于破产，结果使各国多少有些不得已而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仿佛这是总统奥巴马所谓的“change”，但这种转变并非颠覆，而毋宁说是再次证明了“历史的终结”。

在《跨越性批判》中，我曾经指出：所谓民族—国家，意味着用连字符将国家和民族这两个不同的东西结合到一起。但是，为了观察近代社会构成体，我们还

^① 弗朗西斯·福山似乎从其师阿兰·弗罗姆那里学到了亚历山大·科耶夫的思想。不过，科耶夫与他们不同。对他而言，“历史的终结”这一观念没有一定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历史的终结上，社会将如何变化呢？最初，科耶夫认为将变成“共产主义”。可是，后来科耶夫在美国式生活（动物性的）和日本式生活（假绅士的）中发现了历史的终结。参见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日文版，东京：国文社。

要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说，应该将其视为资本—民族—国家，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装置。例如，如果放任资本制经济不管，结果则势必造成经济上的差距和对立。而民族是以共同性和平等性为志向的，因此必将要求解决资本制所造成的差距和各种矛盾。于是，国家便通过课税和再分配及各种规定来实现这一要求。资本、民族、国家均是不同的东西，各自依据相异的原理，但在这里它们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环，缺一不可地结合在一起。我称之为资本—民族—国家。

在我看来，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这一事态，意味着资本—民族—国家一旦形成，根本的变革便无以实现了。实际上，近年来世界各国的“转化”不仅没有捣毁资本—民族—国家，反而证实了这一装置在有效地发挥作用，资本—民族—国家这一连环仍是安然无恙。人们由于没有自觉到被封闭于这一连环的回路中，故虽在其中团团转而不得出路，却错以为历史在前进呢。我在《跨越性批判》中这样写道：

常常听到这样的预见，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民族国家行将消亡。的确，由于海外贸易导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网络已然发达，在一国内部实行的经济政策已经不如从前那么有效地发挥其机能了。但是，国家和民族并不会因此而消亡。例如，一旦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使各国经济受到

压迫，就会谋求依靠国家的保护（再分配），而转向对民族文化同一性和地区经济的保护。与资本对抗，必须同时对抗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其理由也正在于此。资本制—民族—国家正因为是三位一体的，所以才十分坚固。如果只否定其中的任何一项，结果都会被收回到那个连环中去的。因为，它们并非单纯的幻想，而是植根于不同的“交换”原理。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分别建立在不同原理上的民族和国家。换言之，对抗资本必须同时与民族和国家相对抗。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主义并非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的，而是资本制—民族—国家谋求继续生存的最后形态。

我做出上述判断是在 1990 年代，如今亦没有任何修改的必要。资本—民族—国家实在是一个巧妙的结构体系。不过，我所关注的不是对这一结构体系的赞扬，而在于如何超越它。关于这一点，与写作《跨越性批判》的 1990 年代相比，2001 年之后我的想法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促使我对“世界史的构造”进行综合考察的，则是 2001 年以后事态的变化。

在 1990 年代，我考虑过如何在各国实践针对国家的新的抵抗运动，那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展望，只是茫然地以为那样的运动自然是一种跨国的联合吧。正如

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所象征的那样，这种运动的气氛存在于各地。例如，德里达曾提倡“新国际主义”，奈格里和哈特倡导一种“民众”的世界同时叛乱。我自己也带着相似的展望，开始了实践性的运动。

然而，这种乐观主义因2001年即我出版《跨越性批判》之际所发生的“9·11”事件而遭到破灭。这一事件看上去仿佛宗教性的对立使然，其实它所暴露出来的是“南北”之间深刻的矛盾。而且，在此不仅仅是各国家之间的对立，还显示了针对资本与国家的抵抗运动本身的分裂。那时，我深切感受到国家和民族并非单纯的“上层建筑”，它同时也是作为能动的主体而运转的。针对资本和国家的抵抗运动一旦突破一定的水准，就必然会被分裂开来。以往是这样，今后也会如此。我想，自己于《跨越性批判》中所做的考察，需要从更根本的方面加以重新尝试。

在此，我想到从交换样式的角度入手对社会构成体的历史重新进行综合的把握。这样一种考察，原本是由马克思所提起的。然而，要全面地加以实施，就需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予以否定。我断定，仅仅对马克思的文本加以重新解释已经远远不够。直到2001年为止，我根本上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来阅读马克思和康德的文本的。换言之，即使有自己的看法，那也仅仅是从文本分析中推导出来而加以提示的。这种文本解读自然有其局限。我个人的意见有不少地方与康德和马克思

相反，而且有很多是他们未曾思考的领域和问题。因此，当思考“世界史的构造”之际，我感到有必要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往，我不喜欢构筑体系这样的工作，也拙于体系创造。但这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试要建构理论性的体系。这也是因为我所着手处理的，是非体系化则无法谈论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课题就是要重新通过马克思来批判黑格尔。因为，将资本、民族、国家作为相互关联的体系来把握的，正是《法哲学原理》的作者黑格尔。他不排除任何的契机而把资本—民族—国家作为三位一体的体系给予了辩证的把握。这同时也是综合了法国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而形成的东西。马克思从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起步，但那时他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基础，而视民族和国家为意识形态之上层建筑，因此未能把握到资本—民族—国家这一复合的社会构成体。也便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如果废弃了资本主义，那么国家和民族将会自然消亡。结果，马克思主义运动在民族和国家的问题上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看到国家、民族与资本一样，有着仅凭启蒙所无法消解掉的存在根据，更没有意识到它们原本有着相互关联的构造。要真正扬弃宗教，首先得认识资本、国家和民族到底是什么东西。倘若只是单纯的否定，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结果只好承认它们的现实性，并导致对试图超越资本、国家和民族的